

叶鹏飞/著

青年学者文库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定居意愿研究

Identity and Residing Preference of
Migrant Workers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定居意愿研究

Identity and Residing Preference of
Migrant Workers

叶鹏飞/著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定居意愿研究 / 叶鹏飞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1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112-5071-1

I. ①农… II. ①叶…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945 号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与定居意愿研究

著 者: 叶鹏飞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1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2. 7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071-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 1.1 问题的提出 /1
-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评述 /4
 - 1.2.1 农民工研究的两种路径 /4
 - 1.2.2 农民工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研究 /5
 - 1.2.3 农民工定居转移问题研究 /8
- 1.3 理论基础 /10
 - 1.3.1 认同与社会认同理论 /10
 - 1.3.2 国外人口迁移理论 /14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21

第2章 研究框架 /24

- 2.1 结构分析的思路 /24
- 2.2 分析框架 /26
- 2.3 主要概念 /28
- 2.4 研究假设 /29
- 2.5 研究方法和调查地介绍 /31
 - 2.5.1 研究方法 /32
 - 2.5.2 调查地简介 /33

第3章 城市生活及其变迁 /35

- 3.1 制度层面的演进过程 /35
 - 3.1.1 农民流动的限制 /36



3.1.2	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政策限制	/37
3.1.3	农民工政策的改善过程	/39
3.2	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41
3.2.1	农民工的代际分化	/41
3.2.2	农民工的子女	/46
3.3	当前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况	/48
3.3.1	基本人口学特征	/48
3.3.2	农民工的生活与工作	/50
第4章 社会支持 /61		
4.1	城市之旅	/61
4.2	亲缘性求助体系	/63
4.2.1	遭遇的困难	/63
4.2.2	向谁求助?	/65
4.3	“内卷化”社会交往	/67
4.3.1	“内卷化”的分析概念	/67
4.3.2	社会交往的内卷化	/68
4.4	缺失的权利与保障	/77
4.4.1	就业中的“软强迫”与“硬强迫”	/78
4.4.2	福利保障情况	/79
第5章 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 /83		
5.1	城市生活满意度	/83
5.1.1	“适应-不满”的二重心理	/83
5.1.2	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85
5.1.3	多元回归分析	/87
5.1.4	小结与讨论	/92
5.2	城市生活中的幸福感	/93
5.2.1	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94
5.2.2	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97
5.2.3	总结与讨论	/103
5.3	本章小结	/104



第6章 身份归属认同	/106
6.1 感受他人的目光	/106
6.2 身份认同	/110
6.2.1 我不是城市人	/110
6.2.2 身份归属的回归分析	/111
6.2.3 生活感受对于归属认同的影响	/115
6.3 农民工生活中的城市性	/118
6.3.1 如何支配闲暇时间	/119
6.3.2 权益表达的方式	/121
6.4 本章小结	/123
第7章 城市定居意愿	/125
7.1 研究假设和变量说明	/126
7.1.1 研究假设	/126
7.1.2 相关变量	/127
7.2 回乡还是进城	/129
7.3 回归分析	/132
7.4 制度因素还是市场因素	/136
7.5 本章小结	/139
第8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	/140
8.1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141
8.1.1 文化程度较高,但职业技能不足	/142
8.1.2 职业以制造业、服务业普通员工为主	/143
8.1.3 较早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体系	/145
8.1.4 多数处于未婚状态	/146
8.2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中的主要问题	/146
8.2.1 边缘性的生活世界	/147
8.2.2 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150
8.2.3 地位差异和相对剥夺感	/151
8.2.4 矛盾的城市身份认同	/156
8.2.5 权利意识与实际权利的落差	/157



8.3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159
8.3.1	经济因素	/160
8.3.2	文化心理因素	/162
8.4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方式及对策	/163
8.4.1	定居于打工城市	/163
8.4.2	定居于家乡所在地的县城或集镇	/165
第9章	结论与讨论	/167
9.1	主要观点	/167
9.1.1	同质性的底层群体	/167
9.1.2	一般水平的基础性城市认同	/169
9.1.3	低水平的身份归属认同	/170
9.1.4	模糊性的城市定居意愿	/171
9.2	制度思考	/172
9.3	研究展望	/176
参考文献		/177
附录A 结构式访谈提纲		/185
附录B 调查问卷（摘录本研究部分）		/187
后记		/194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处于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居住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75%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未来几十年里,中国还将有30%的农业人口需要实现非农化。与之相应的是,人口流动、农民进城及其市民化的问题将是中国社会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从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至今,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史及其在城市中的生活史已近30年。这个漫长的流动之路,是一个饱含辛酸和血泪的艰辛历程,这个过程远没有结束。根据农业部的监测数据,从1995年到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数量由5066万人增加到11891万人,今后几年每年新增人数还将维持在500万~700万,增速大约在5%~6%(张红宇,2007)^①。按照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2542万人。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①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长3.0%。从微观上看,这个群体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当中,在大量外出的同时,也伴随着返乡的回流,二者交替发生。但是总体上它的规模仍在不断增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使农民工的群体结构更为复杂。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分析报告《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09年3月25日,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index.htm>。



在农民工流动的初期,学术界关注的是流动的原因和机制,关注人口进城给农村和城市社会带来的影响等;但是到30年后的今天,很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拥有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且有更多的年轻人带着“城市梦”来到这里。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新的问题,那就农民工的将来。他们是否会在城市化大潮中把“根”留在城市?抑或他们在多少年的打拼之后,又返回曾经熟悉的故乡?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成为本书的研究主题。而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认同常常被认为是群体行为的基础。

然而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农民工的市民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脱节现象,表现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迟滞这一相悖的事实。

改革之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当低,政策取向基本上是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的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到新世纪之前的20年,城市化进程较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城市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99年的30.89%,但与同期工业人口增加的比例并不同步,城市化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李强,2009)^①。进入21世纪以后,城市化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是36.09%,2005年则达到42.99%。因此,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特点,不仅表现为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水平低,同时也表现为城市化速度的迅速加快。

在这个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后,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自2000年开始,这个“城市化率”在统计上已经开始包含城市中的外来人口。^①然而,城市化的意义远远不止是城市化率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套数据,其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结构的转型高度重合并相互影响,一方面涉及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方式,以及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另一方面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李强等,2009)^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本身内在包含着农民市民化的过程。这种“市民化”不只是意味着一种身份的转变——当然这种身份转变应该是最基本的,更是一种社会成员的角色转型。

因此,农民工作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统计上的概念,城市化与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脱节的。当然,市民化的问题不仅涉及农民工,同时也包括另一类人群,即由于城市的扩张而失去土

^① 国家统计局在《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1999〕114文的解释中指出,文件中的人口指标为“在调查地居住半年及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



地的郊区农民。但相比于农民工而言，失地农民基本上实现了身份和职业的转变，问题主要在于他们是否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融入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则仍然面临着一个非常基本的矛盾和问题，因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他们不过是在城市中居住了一定时间，并且暂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甚至可能只是暂时的转变，但却没有改变最基本的身份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没有融入城市，无法享受城市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比如消费、休闲等等。据报道，从2008年开始，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估计有2500万左右的农民工因失业而返回家乡，占到约2.2亿农民工总数的10%以上。快速增长的城市化率背后，隐含着—个市民化迟滞的事实。农民工的将来究竟会怎样？几年、几十年之后，当他们不得不离开城市返回家乡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又将被“农民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他们是否在城市中重新找到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哪些因素成为他们市民化的限制条件，就显得非常重要，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就以往的国际经验而言，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往往在城市中形成了新的贫民阶层，其独立的生活系统与当地居民相隔离，群体之间相互割裂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尤为明显。一些拉美国家，比如巴西，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从30%左右增加到70%左右只用了40年时间（美国相应的则用了近100年时间）。而在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的同时，巴西的工业化发展并未保持同步水平，由此导致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例如大量城市移民失业、贫困问题严重、贫民窟数量众多等，也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转型陷阱”。从这些经验教训来看，探讨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城市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显然是既迫切也很有价值。

此外，在农民工对于未来定居地的选择上，有些决策者的认识和已有的一些研究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甚至与现实不太相符。一位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政府官员曾在一个会议上提出，国外的移民主要是为了就业而进城，而中国的农民进城则是为了迁移和定居。同时，目前很多关于农民工的研究都非常乐观地认为大部分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并期望居住于城市。这与我们很多实证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且以这种观点为指导的农民工政策必然会—定—的问题。因此，从作为主体的农民工出发，考察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认同，他们的定位，以及对于未来去向的期盼，其必要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1.2 研究现状与文献评述

1.2.1 农民工研究的两种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研究的力度和深度都处于不断的拓展当中。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宏观的结构分析,着重从总体上把握农民工群体的结构特征;二是微观的质性研究,注重在具体的情境下考察农民工的日常实践逻辑。

早期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量化的结构性研究是当时的主流研究方式,多数研究希望通过较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来揭示和描述农村流动人口的总量、结构、空间分布、流动方式、规则和流动机制等,大多延续一种“描述现象、分析原因、对策建议”的常规模式,在理论上多借鉴国外关于人口迁移的相关理论,而于自身却没有太多的建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民工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农民工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之后,有关农民工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并且被置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代际分化、性别区分、社会融入、群体认同等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质性研究(通常也称作定性研究)成为一种潮流,并逐渐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在这一大的研究背景下,在农民工的研究当中,也出现注重定性分析的新的研究倾向和研究传统:从宏观的定量分析转向微观的定性分析,从社会结构层面转入农民工的具体日常生活。

渠敬东(2002)^{198~215}在《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中,认为从研究范式的角度,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配置及其组织机制等社会学预设入手,在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化限制和区域性限制的层面来处理这一问题。而研究预设和方法本身有可能会简化材料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排除那些难以归类却恰恰最具有社会效果的现象;结构分析不能等于社会研究的全部。因此,他提倡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认为农村外来人口研究的基础应该转入日常生活的层面,返回到他们构建并生活其中的世界,研究他们的行为方式、意义脉络和价值取向。



沈原(2007)^{178~180}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中,认为现有的农民工研究欠缺明显的阶级分析取向,在对农民流动的过程和特点的研究中,众多大样本量的调查数据,都试图提供农民流动的总体性画面,但这种数据分析和量化描述也把农民工变成了一个抽象而庞大的社会范畴。相对那种进行了差不多10多年在抽象水平上的研究,沈原认为有理由将农民工研究从“抽象工人”转换到“具体工人”——提供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并且返回到生产中心性,进行民族志的研究。

实际上,这种新的研究趋向与西方社会对于人口迁移研究的历程不无关联。西方社会学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项飙,1996),这三种范式正体现了研究的着力点从宏观结构性分析向主体性研究的转变趋向。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下的“均衡”范式。人口流动视作是由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的(典型的如“推一拉”说),而其结果则使经济要素在各地域间形成新的平衡。移民在迁入社会的适应,也被假设为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被不断同化的过程。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认为人口流动不全是物质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反应,而跟一系列的传统、结构与历史因素有关。比如用“世界体系”理论来解释国际移民。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人的流动被视为对特定结构的回应,其结果将满足结构的某种潜在需求。第三种范式是在吉登斯、布迪厄等人在社会学理论兴起后提出的,项飙将其称为“主体—实践”(agent-practice)范式,强调移民也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

今天这两种路径都深刻地影响了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它们分别以结构和主体、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等方式,刻画出农民工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丰富内容。未来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必定是两种路径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

1.2.2 农民工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研究

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本书主要是从研究的主题出发,重点对农民工社会认同和定居转移问题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回顾。

尽管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文献已有多年的积累,但是围绕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历史并不长。“农民工”本身即是一种由社会建构的类别,是由于



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而造成的一种特殊身份。但是这种身份只是一种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它的两侧分别是“农民”和“市民”，农民工最终依然要在这两种身份中选择一种认同。与社会认同紧密相关的是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事实上，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很难区别出谁先谁后，它们的关系更近似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农民工的认同过程中，一些属于融入性的行为是相伴始终的。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的学术探讨也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很多研究内容——比如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市民化问题等，既可以在社会认同中进行研究，也可以归入到社会融入的主题当中。

有研究指出（陈映芳，2005），农民工这一身份类别是在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制度安排的作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城市政府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成功地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移植于城市内部，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使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城市里的非城市人”，即制度规定的“非市民”。除去制度安排之外，农民工身份建构中的另一个重要力量是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等知识、文化的生产者对于“农民工”身份类别的标定。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该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中所经验的相对剥夺，往往会促使他们接受“农民工”的特殊身份。来自制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偏见和歧视，多少会造成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困难，并导致他们将“城市人”对象化、本质化，对城市和城市居民抱有排斥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作为城市局外人的“我们农民”身份的认同，可以被视为他们在感受相对剥夺情况下，致力于自我保护的一种应对行为。也就是说，对“农民工”这一身份的认同，会给这些迁移者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去接受他们在城市中面临的不公平的地位和待遇。

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的身份，尽管这一群体已经存在、并可能会继续存在很长时间，但是这种身份最终都需要走向一种归宿。因此，笔者认为讨论对“农民工”这一身份的认同也只是一个初始问题，甚至是一个伪问题。

国内在农民工社会认同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少，散见于零星的各种调查之中。项飏（1998）⁴⁶⁻⁴⁸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占 61.6%，认为“也算是城里人”的占 8.7%，还有 16.5% 的认为自己“既不像农村人也不像城里人”。朱力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农民的认



同问题进行了讨论（朱力，2002）。在他的研究中，适应意味着对周围环境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适应显然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部分。他把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划归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适应，三者分别指涉三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该研究也列举了关于进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定位的一套数据：在 388 个样本中，有 40% 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有 37% 的人“说不上”自己的身份定位，另外有 20% 的人把自己划归为“半个城里人”，只有 3% 的进城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朱考金在南京市调查结果（朱考金，2003）：59.2% 的进城务工人员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认为自己“已经是城里人”的占 15.6%，另外的 21.8% “说不清楚”。

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的结果都很类似，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并不强，表现在他们对于城市人身份的认同比较微弱，大部分农民工宁愿认同农民身份，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对这种身份认知并不清晰，农民工的城市边缘性特征一直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研究虽然都是在实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但分析和阐释力度稍显不足。

鉴于中国社会城乡结构的特殊性，很多关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研究都十分重视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尽管城乡社会结构是处于不断的弱化当中，但它对于农民工的影响是现实的，并且依然会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农民工在职业上实现的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这是制度性因素弱化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制度安排的因素又具有根本的规定性，城市政府并未在实质上将他们纳入市民的范围，其结果是导致这个群体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一种困境，从而处于一种“无根”或游离的状态，导致“问题民工”的产生或诱使部分农民工依托传统关系网络，结成社群，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难以融入城市。（项飏，2000；孙立平，2003）

有的研究则明显受到国外移民研究中“族群飞地”概念的影响（文军，2005），认为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农民流动，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新移民”群体。劳动力新移民本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移民系统”。在这个移民系统里，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三重结构。宏观结构层面主要是指国家相关制度、政策、法规，以及城乡经济状况、社会发展关系，它将移居城市的农民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中观层面的社会网络是对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有利于降低移民成本，帮助重建在迁入地的各种社会关系；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则可能直接导致移民的差异和分化。朱力将进城农



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称为“准市民”（朱力，2000）。然而这个准市民基本上并未具备市民的一系列特征。首先在认同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将自己当作农村人，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社会歧视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准市民与城市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油与水的关系。

与从外部结构性因素入手进行分析的思路相对应的是从农民工主体角度进行的一些研究。王春光以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身份、职业和流入地社会方面的认同情况（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他们不认可现有的制度性规定，而更加重视周围社会对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在城市社会并没有确立明确的社区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意识，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尝试着去认同城市社会。这些人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更有可能不会（或者不愿）重新返回他们的家乡。

从总体上看，在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上的研究，急需将外部结构性解释和主体性的理解两种研究思路综合起来。宏观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分析将农民工的认同和融入问题放置在整个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这对于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立足于国家社会、立足于研究者的分析视角，难以揭示农民工这一主体在对城市社会、职业身份等认同上的主观程度，并且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同样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非制度性因素。正如我们在定义城市化时所特别强调的那样，城市化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性因素只是一个前提、一个条件，主观的接受和认同才是最终的标准。很多研究者已经将分析的重点转移到农民工主体性研究，比如前文提到的王春光的研究，以及王毅杰等人的研究（王毅杰等，2004）。本书将延续这一传统，注重从农民工的主体性角度来讨论其城市认同及定居意愿，同时也会涉及对各种结构性因素的讨论。

1.2.3 农民工定居转移问题研究

定居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在经历相当长的一个流动时期后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早期研究者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问题焦点的转移，不少学者对人口流动的研究开始逐步从一般性的流动原因研究转向对永久（或户籍）迁移的研究。有研究发现，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进城务工的收入预期越高，因此他们更愿意放弃土地



进城定居（侯红娅等，2004）；任远的研究显示，外来人口在迁入地的居留时间长短是决定是否迁移定居的主要原因（任远，2006）；赵艳枝（2006）的研究证明，在迁入地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家庭式流动、在迁入地已购买和自建住房、原来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定居；朱宇则认为，稳定的收入和好的保障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做出永久迁移的原因（朱宇，2004a）。

但是蔡禾、王进（2005）⁸⁶⁻¹¹³认为以往的研究大部分都笼统地以流动人口为分析对象，专门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不多，而建立在笼统的“流动人口”研究基础上的结论对农民工是否有解释力是值得怀疑的。并且这些研究在考察永久迁移的影响因素时，没有将经济、社会因素引入分析。因此他们分析了在城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选择城市户籍而做出永久迁移城市的决策。他们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放弃土地作为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迁移动力，相对集中在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城市生活方式认同上，是一个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那么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主要原因则相对集中在地域性因素和制度合法性压力上，是农民工寻求制度保障来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在不同迁移意愿的人群中，个体迁移动力与制度合法性压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蔡禾、王进的研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他们并非是将迁移行为进行分类，而是将迁移意愿按照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永久和非永久性进行区分，得出四种迁移意愿类型。实际上对迁移意愿进行这种永久性和非永久性的明确区分是很困难的，四种类型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晰。

还有的研究是侧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的流动过程，考察农民工是流动还是迁移（盛来运，2008），认为收入对劳动力的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哪种行为，都是人力资本选择的结果。同时研究也将家庭规模、土地资源和土地制度、家庭财产等因素纳入到分析当中。这类型注重经济角度的分析，而对一些社会性的因素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探讨。很多研究将重点放在进城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等方面，而忽视了农民工在市民化问题的制度内涵和文化内涵。市民化不只是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怎样、社会地位如何，



而是他们是否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当中,从国家层面来看,制度安排是否不对他们另眼相看。与市民化问题相伴随的,就是关于“逆市民化”的农民工回流研究(白南生,2002)。

1.3 理论基础

1.3.1 认同与社会认同理论

人们总是要在生活之中寻求一种自我与他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是一个对自我、对群体进行界定、分类和归属的复杂过程。这就是在现代社会学 and 心理学领域中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认同”问题。

“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词根 idem,是相同和连续一致的意思。通常是译成同一性、身份,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在他的《哲学与心理学辞典》中将其解释为“某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认可,其中包括其自身统一性中所具有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这一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同一性”(James M. Baldwin, 1998)⁵⁰⁴。简金斯认为,“认同”一词有两方面的意涵:第一,相同性(sameness),即A和B相同;第二,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由此可见,“认同”揭示了人们(或事物)之间比较的两种标准:“相似”(similarity)与“差异”(difference)。也就是说,“相似”(或相同)与“差异”是认同的辩证依存的两个方面(Jenkins, 1996)。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群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他人”或“他们”)的差别。

Fornäs 进一步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分析了认同(Fornäs, 1995)²³²。从时间的角度看,认同指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认同是指在较长跨度的时期中可被识别和辨认的某些较为稳定的属性和特征。从空间的角度看,个人认同是指把个人的各个方面结合成某种连贯的结构性模式,而群体认同则是散布在空间中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的相同和一致,也即认同并非是静态、不可变化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互动和建构的过程(Fornäs, 1995; Jenkins, 1996)。它处在形成和变化过程中,只能理解为“成为(being)”和“变成(becoming)”的过程(Jenkins, 1996)。

围绕认同或社会认同,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形成两种不同取向的理论范式(周晓虹,2008),即社会学取向的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